

空前之迹

王绯 著

1851—1930:

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



空前之迹

——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

王 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原创性: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妇女解放	1
第一节 妇女解放:黑色背景与红色时代	1
1 历史分期与性别颠覆	1
2 划时代与超时代	4
3 浓缩景观与非常背景	13
第二节 妇女:法律上的死亡与复活	28
1 刀山之巅尖的妇女生活	28
2 法律与妇女死亡	35
3 物权制度与男女平等	38
4 改写交换女人的人类婚姻史	45
第三节 跨文化:性别特权与“斥尼亚拉”公式	58
1 跨时代与跨阶级的性别特权	58
2 斥尼亚拉公式	68
第四节 最后的盛宴:封建末世妇女与文学	71
1 闺阁操练:刀山之巅的盛宴与聚餐	71
2 “赋权”:来自父亲的礼物	72
3 红颜知己:文化身份与文人时尚	79
4 文化花边:光荣与梦想	91
5 文学游戏:自娱与偕行	103

2 空前之迹

6 悲命：“第二性”私语与游离	116
第二章 先驱性：维新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	129
第一节 西学与男性先驱妇女观	129
1 站在两个肩头之上	129
2 戒缠足与强国保种之意识传染	137
3 兴女学与男性之政治远谋	149
第二节 合群：踏着父兄思想足迹的妇女解放先觉	162
1 合群与最早的女子社团	162
2 “群言之合”与第一张女报	164
3 踏着父兄的思想足迹言说	169
4 妇女自己的声音	177
第三节 最初的牵手：近代妇女文学书写与政治	178
1 告别闺阁操练	178
2 妇女文学与政治牵手之谜	182
3 白话诗文与妇女先声	193
4 近代妇女“政治新诗”	199
第三章 独立性：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	206
第一节 群醒与独立：辛亥革命前十年女界风暴	206
1 敲响“女界钟”	206
2 女界独立宣言	215
3 反贤妻良母与女国民	227
4 尚武精神与结大团体	246
第二节 铁血与参政：辛亥革命后的女界狂飙	257
1 尚武女英杰群	257
2 铁血主义与女子从戎热潮	264

3 铁血主义与女子后援运动	272
4 参政与女界艰难时世	277
5 参政与普及女子教育	287
6 思想纷争与男权阴影	291
第三节 女界文学变革:跨进 20 世纪的亮点	297
1 诗文“蛾眉独立时”	297
2 女界新文体	306
3 女界革命新诗	328
4 妇女小说的新因素	350
第四章 阶级性:“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	387
第一节 阶级与两性合力:妇女解放思想的指向	387
1 妇女:新文化斗士手中的一张牌	387
2 妇女解放:第四阶级与社会主义	406
3 两性合力:妇女解放思想的阶级逻辑	427
第二节 理想与拘执:“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三部曲	430
1 血的蒸气:婚姻与家庭革命	431
2 “界”之颠覆:社交公开与女性职业	458
3 醒的声音:教育平等与大学开禁	473
第三节 纯真与意义:“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女性创境	483
1 纯而真:女性的现代白话文学起点	483
2 意义之旅 A:时代/社会革命与人生问题	493
3 意义之旅 B:“五四”落潮后的爱歌与悲海	500
4 意义之旅 C:两性恋情与盘桓	513
5 诗之创境:纯粹与哲思	518
第五章 民族性:大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	538

4 空前之迹

第一节 团结与国民革命:各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及

发展路径..... 538

1 主旋律:民族/国民革命妇女观..... 538

2 中国女界各阶级分析..... 547

3 第一代女兵与北伐炮火中的妇女..... 558

第二节 战斗与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的妇女

思想发展..... 561

1 背景音乐:血染的风采..... 561

2 战略部署:阶级分化与策略..... 564

3 理想蓝图:妇女与苏维埃政权..... 566

4 民间困境:妇女解放与社会..... 567

第三节 成长与母题:现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发展趋向..... 570

1 背景大势:两个文学世界的分立与融合..... 570

2 成长的烦恼:没有归程的追寻..... 575

3 成长的滞重:自我囚禁与人生逃亡..... 587

4 成长的醒觉:审视父权/男权世界..... 604

5 成长的超越:时代与社会革命进行曲..... 614

6 女性的成长:环境与机遇..... 630

结语..... 636

主要参考文献..... 637

后记..... 643

第一章 原创性：太平天国革命 与中国妇女解放

第一节 妇女解放：黑色背景与红色时代

1 历史分期与性别颠覆

1840年，对于中国历史分期而言，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象征符号。用通常的说法即是：这一年，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强行将偌大的中国沦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身不由己地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这一用国耻书写的中国近代史开端，标志着社会历史性质的改写——中国，从此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1840年以后，大举进入中国的，除了洋枪洋炮，更有“洋教”、“西学”，以及其他包括民主、科学观念、制度和器物等“舶来品”。由于种种异质文化要素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行移植和渗透，中国近代史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的中西文化整合的特征。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讲的：“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

2 空前之迹

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去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1851年,在广西金田爆发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这一特定时代及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太平天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坚持了18年之久,荡涤18个省,600多个城镇,其意义和影响之大,已大到后人不能不在史学研究领域为它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乃至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着这次社会革命的著述之多之广,赋予了它无尽的话题。在今天看来,太平天国革命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重要象征符号,只不过,这个历史,是社会性别意义的历史。就像1840年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或中国社会历史性质被改写的象征符号,太平天国革命应成为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具有某种原创意义和影响的划时代标志。

这样的观点,是受美国当代妇女研究的开拓者琼·凯利-加多(Joan Kelly - Gadol 1928—1982年)思想的影响。凯利-加多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妇女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殊含义,即在寻找将妇女增补到历史知识之库的过程中,动摇了史学研究的概念基础。这种动摇,来自于对史学思想所关注的三个基本方面——历史分期、社会分析范畴、社会变迁理论——的质疑。她指出:在审视引起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运动,对其做出评价时,不应该将妇女的地位和权力排除在外,而在历史研究中则有一个相当有规律的模式,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财富、法律、政

府、艺术、科学的领域，作为史学家的男人们认为恰恰是这些现象构成了文明，因而有了阶级外交史、经济史、宪法史、政治史及文化史。正是由于这样，在一些被认为是进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妇女却相对失去地位与权力——

如果我们引用傅立叶的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我们对所谓进步的认识，如古典的希腊文明、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将得到令人震惊的重要评价。对妇女来说，雅典的所谓进步，意味着纳妾制和对公民妻子的幽禁；欧洲的文艺复兴，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妻子们专事家务，以及对女巫愈演愈烈的跨阶级的迫害；法国大革命也明显地把妇女排斥于“自由”、“平等”、“博爱”之外。突然间，我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视察这些历史时期，眼前呈现的是不同的画面。

至今，这些画面中只有一种被载入史册。无论这些时期是如何被评价的，均出自于男性主导视角。……他们不考虑证据，就肯定地认为妇女与男人共享这些进步。^①

基于以上认识，凯利-加多提出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分期的思路，即：在考察一个有着“进步”意义的大历史时代划界的时候，这一历史分期所提供的则是不再把妇女排除在它所产生的政治、经

^① 王政、杜琴芳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84～85 页。

4 空前之迹

济、文化的进步利益之外,而是与妇女的地位和权力相关联的历史;一旦在完全的意义上将妇女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来考察历史,便将其在解放或压抑妇女利益上有怎样的潜在能力,对提高男女人类状况起着怎样的作用,作为确认历史是否“进步”的重要尺度。

按照这样的尺度,太平天国革命应该成为一个对于妇女解放而言有着特殊进步意义的大历史时代的划界。

2 划时代与超时代

1860年,一位叫呤唎(A. F. Lindley)的20岁英国青年来到中国,怀着对太平天国事业的钦慕,志愿参加了太平军。4年后,这位“前太平军上校”回国,作为这一次革命的有力见证人,忠实地执行了忠王李秀成请他“向外国人宣告革命的宗旨、革命领袖的愿望和主张”的嘱托,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被史学家认为是“具有一定思想性、科学性的著作”^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使我们得以通过这位太平天国洋兄弟“所能记述的一切问题”,深入到这次革命的内里,了解当时的历史真貌与实情。

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呤唎记述了他到中国后所看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妇女世界——

在太平天国外面的世界:华南地区的洗衣妇女“几乎毕生过着水上生活,从生到死都在漂浮的船上家里”,“这些洗衣女人年纪很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小就被买来训练过邪恶的生活”，“这些小妖精揉碎了水手的心”，“每到发薪水这一天，照例这些漂亮姑娘的数目和爱情就惊人地增加起来；从她们临别走过听到的叮叮当当的洋钱声，就可以知道她们温柔的功夫不是白费的”。“有些歌场，并无季节性，而是经年常设的”，“其中女伶较男伶多得多，而且都是缠脚的。她们用前所未闻的尖噪喊叫，直到把嗓子喊哑，然后走到听众面前讨赏”，“她们正像一只青蛙用两只绑在高跷上的后脚直立行走一样”，“脚是缠着的，而且缠得像小小的蹄子，五趾完全压在脚板下勉强可以穿上鞋子；但是看一看踝骨、脚背和后跟罢，你什么也分不清，只见浑然一团，很像象脚”；“当这些天朝歌女一颠颠地走到你面前坐下来的时候（也许恰巧看中你，坐在你腿上），按照礼俗，你得‘随意’叫一桌酒招待她们”；“卖笑妇女总是公开接客，通常被招去伴席，她们在席间以自己的歌喉和风情来娱乐嘉宾。每个迷人精都拿一把扇子，上面开列各色曲名，请客人传观点唱。男宾的妻女从来不出席这种音乐晚会，因为这班可怜虫等于活商品”，“她们只理家务，其他一概不闻不问”，“妇女地位这样低贱，她们的权利也就自然被剥夺，所以一个歌女可以霸占一个有许多妻子的男人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许多妇女被卖为奴婢，但更多妇女却终身被卖为娼妓。专营此业的场所极多，其中成百上千的妇女自幼买来，以便养大之后操此贱业”，“只要考虑一下中国的广大人口以及这么多的女孩子全都买去操此贱业，那么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广大的偏僻地区，我曾看见一些自 12 岁到 20 岁的年轻漂亮姑娘被她们的母亲和投机商人标价出卖，每名售价 6 元至 30 元不等。我常常听见中国人说：‘有时可以若干文钱一斤的价钱买到一个漂亮姑

6 空前之迹

娘,比猪肉还贱。’”^①

可是,在太平天国的世界,呤喇看到的却是“彻底废除了令人憎恶的奴隶制”,“严厉取缔这类事件”:

太平天国已经废除了妇女缠足的恶俗。虽然在他们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之下,女孩子不再遭受此刑,可是他们的妻子有许多人却是可怕的“小脚”,除广西人、一部分广东人和苗族外,其他各地妇女都遵守这种毁足的习惯。太平军起义后出生的女孩子全都是天足,这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使她们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外貌。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的外貌大为改善,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太平天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地超越了她们的姊妹,那些束缚在清朝家庭制度中的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太平天国的辉煌标志之一。

太平天国妇女或结婚成为家庭一员,或入姊妹馆,(许多大城市中都设有姊妹馆,由专人管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这条法律是为了禁娼,违者处以死刑。自然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是完全绝

^① [英]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一、十六章,王维周、王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迹的……太平天国尊重妇女地位，认为妇女为男子的伴侣，在教育上她们受到了同等的注意，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总之，太平天国采取了一切方法，使妇女符合于她们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所获得的改善地位。

姊妹馆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负责，并特别设有机构以教养那些没有亲人照料的青年妇女，以及那些因丈夫长期出外工作而无亲人供养的已婚妇女。许多妇女陪同丈夫随军出征，以热烈的激情分担战场上的危险困苦。她们在战场上大多骑着中国的小马、驴子或骡子。革命初期，她们曾勇敢参战，有的并担任了军官的职务，军队中男女分营，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

在呤唎看来，“太平天国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已经由亚洲国家妇女所处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太平天国革除了两千年来妇女所受到的被愚昧和被玩弄的待遇，充分证明了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进步性”^①，从他所记述的太平天国妇女世界里，我们亦不难捕获种种在实践意义上划时代，甚至超时代的解放妇女与妇女解放的讯息。（请注意其中的关键词：**划时代 超时代 实践**）

所谓划时代，是一种开天辟地，它构成了与前时代某种性质上

① 以上引文参见[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一章。

8 空前之迹

迥然不同的划界；超时代，则是指对于所处时代的超越，是一种超前的体现。这里提出的太平天国革命划时代和超时代的观点，是以社会实践为主要依据的。

在近代前夜，封建社会母体内已开始孕育解放妇女思想的萌芽，比如，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表现出了女子对婚姻自主的渴望与寻求；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中，不仅表现出反对缠足及强迫妇女守节、一夫多妻的思想，而且触及到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根源——俞氏以“《白虎通》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儒说御妻为御妾，以就其齐义，又何以处《礼曲》妻妾并举之文”^①，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教条；另外，他在《节妇说》里明确提出“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②，并通过《贞女说》指出“妇女贞烈是男子光耀”^③，乃至出具弓足小鞋是舞鞋、贱服的考证，发出“女贱则男贱”^④的呼声。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所表现出来的解放妇女的思想更是全方位的，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把其归纳为：反对修容；反对穿耳；反对缠足；反对算命合婚；反对讨妾；承认男女智慧平等；主张女子解放；认为：

他见解最精彩的地方，是认定女子本来是好好的人，同男子一样，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使她们成了“异样”，后

①（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

②（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见《书旧唐书与服志后》。

来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他要给人晓得这种意思,而使人能同情于妇女,知道素来对于妇女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他就用一个“反诸其身”的法子,借了林之洋被女儿国选作王妃的事情,使他身受种种女子所受痛苦,“矫揉造作”,血泪模糊,教人看到这里,不由得想到自己幸得未做林之洋第二,未做女子,一面不能不同情于妇女的不幸,一面就觉得习俗未免有点无理了。这是他反对修容、穿耳和缠足最得力的办法。^①

对于俞正燮、李汝珍,后人一向有很高的评价——张舜徽以为:“自古重男轻女之见,深入人心,牢固而不可破,正燮独大声疾呼,为不平之鸣……议论精辟,发前人所不发……为妇权张目。因非拘墟者所能梦见。近世提倡男女平等之说,而正燮已先揭斯义于百数十年之前,其卓矣”^②。胡适则指出:“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地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做公平的讨论。直到19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大胆地提出,虚心地讨论,审慎地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垂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有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③ 尽管如此,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0~251页。

②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4~365页。

③ 胡适:《〈镜花缘〉引论》,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5~1146页。

我们也必须看到,俞正燮、李汝珍仅是近代前夜提出解放妇女思想的极个别或极少数的先觉者,基于他们个人所处的政治边缘位置,既无法像有能力发动并领导社会革命的政治人物或集团——如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等——那样向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权力进行挑战,或施加某种切实影响,也难以在民间社会形成有一定规模与影响力的思想启蒙及召唤,因而在坚如磐石的封建正宗文化面前,其个人思想的启蒙力度与能量显然是微弱和有限的。这便注定了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和脱节。以上所举证的后人的高度评价,自然是就其思想价值本身而言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先进思想(特别是女权主义思想)尚未登陆近代中国前,在本土文化的瘠壤中已孕育出解放妇女的思想萌芽。这样的思想萌芽,作为一种进步的民族思想遗产,带给后世的启发与影响或许要大于当时,为近代中国的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运动(或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东原论及“中国妇女生活史”时把俞正燮和李汝珍看做“两个女性同情论者”,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他们解放妇女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基于个人立场的“同情”,而非着眼于社会革命及实践。

然而,太平天国革命的男性领导者却大大超越了“女性同情论者”的立场。可以说,这次社会革命所带动的划时代的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运动,既是本土文化中男性先觉者“解放妇女”思想的一种传承,又有赖于西方文化的强烈感召与启迪,同时更得力于划时代和超时代的社会革命实践——即在解放妇女意义上的划时代超时代的立法。太平天国革命正是通过具有强制性的立法实践,确认妇女在经济上、教育上、军事上、职业上应有的实质性权利,在进

行民族、阶级革命的同时,通过严禁娼妓、缠足、蓄妾、买卖婚姻等一系列强行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促发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的运动(或革命)。

显而易见的是,在“解放妇女”这一思想价值层面上,我们难以划时代或超时代来评价太平天国革命(起码,与李汝珍《镜花缘》所体现出的思想相比,它并不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但是,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太平天国革命之于解放妇女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是开天辟地的,是划时代的,是俞正燮、李汝珍无法企及的,而且也是超越那个时代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以后时代的社会革命实践,直接与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所实施的男女平等方针政策接轨(比如,土改政策),从中可见太平天国革命的某种原创性影响。

敏锐的读者大约早已注意到,我在谈及解放之于妇女问题时的两种不同提法,即“解放妇女”与“妇女解放”。从语言结构来看,前者是一个动宾结构词组,其中妇女是解放的客体或对象,即是被动的、被男性当权者解放的角色;后者是一个主谓结构词组,其中妇女是作为主词出现的,是实施解放的主体。之所以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提法,是想以此来概括在解放妇女问题上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中国妇女在解放道路上的本土特色。

比起其他国家/民族,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无论是受迫害的历史(我称之为“中国女性史之阴面”),还是求解放的历史(“中国女性史之阳面”),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中国女性史的阴面上,妇女是处于两重迫害中,其命运为被虐和自虐的左右杀手所主宰——首先,是男人压迫女人,然后是女人比男人更严酷地对